

朱熹思想研究

张立文◎著



社
·
科
·
学
·
术
·
文
·
库

张立文
● 著

B244.75
Z137:1

● 修订本

朱熹思想研究



社
科
学
学
术
文
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熹思想研究/张立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12

(社科学术文库)

ISBN 7-5004-1590-7

I. 朱… II. 张… III. 朱熹 (1130—1200) - 哲学思想-研究 IV. B244. 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6050 号

责任编辑 关 桐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金元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875

插 页 6

字 数 421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定 价 3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提要

朱熹是南宋时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本书运用哲学逻辑结构的方法，提示了朱子理气先后、理一分殊、格致心思、持敬知行、心性情才、诗理自然的理性精神。以及其天理君权、理欲义利、心术王霸、人伦教育的道德精神。诠释其哲学致广大、尽精微之存在，梳理其思想前后之变化，贯通其内在的思想逻辑结构，肯定其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的地位。本书凝聚了作者多年研究朱子思想的体悟，是当前国内论述朱子思想最全面的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关 桐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说明

以出版哲学社会科学各类学术著作为主的本社，自1978年6月成立以来，沐浴着“实事求是”与“思想解放”的时代春风，伴随着日显生机和日益活跃的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十数年来出版了大量的各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著作，积累了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高层次学术图书。为使其中具有精品性质的图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发挥更大的效用，我们从中遴选出若干种组编为“社科学术文库”。

“社科学术文库”从本社已出版的各类社会科学研究著作中拔优选萃，选收那些在各个学科领域里选题重大、研究深入、见解扎实和学风严谨的专著性著作；作者老、中、青兼顾，重名家名作，亦重新人力作。

“社科学术文库”分辑推出，每辑10种，将陆续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11月20日

序

张立文同志勤奋好学，研究朱熹的哲学有年，他的《朱熹思想研究》最近完成，要我写一篇序，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这是因为：

朱熹这个人很重要，应当有专门研究的著作问世。解放后学术界缺少这方面的系统研究，现在有了这方面的著作，是件好事。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年月里，社会风气不鼓励读书，甚至打击读书的情况下，张立文同志居然挤时间，甘于寂寞，埋头读书，不怕坐冷板凳，这种好学态度值得提倡。四十二年前，我写的毕业论文也是：《朱子的哲学》，对这个题目一向有兴趣，也很关心，看到中、青年一代的成长，我很高兴。

由于以上的原因，借写序的机会谈一谈关于朱熹研究的一些看法。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从“五四”算起不过六十多年，六十多年的社会变迁之大超过了过去的几千年。这六十年又可分为两大阶段。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为第一阶段，建国以来到现在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学术研究打破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和“圣人”经传的教条，这是一大突破。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在“五四”以前，谁敢评论他？“五四”以后才把他从“圣人”的宝座上拉下来，恢复了他先秦诸子之一的本来面目。这是打开封建禁区的第一步，使哲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另立门户。当

然，封建禁区打开得很不够，突破旧传统也很不彻底，但无论如何，“五四”以后的学术界开了新生面，这是事实。

随着“五四”带来的思想大解放，学术界活跃起来了，大量的西方外来的文化及各种思想体系被引进，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过，那时人们的眼里马克思主义还仅仅是百家中的一家。又经历了三十年的实践考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已在广大革命群众中扎下了根，它不但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且在它指导下，中国的社会科学也真正成为科学。这就使得过去看不清楚的一些历史现象能够看清楚了，不易理解的一些问题可以理解了，因为人们手中有了唯物史观这个工具。在历史科学领域里取得的成绩尤为显著，这些成绩当然也包括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近三十年来，我们已有了十来部大小不同规格的哲学史或思想史，也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但是也应看到现在的哲学史著作的科学性和体系的严密性，还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要写出高水平的哲学史，必须有大量的专题研究作为支柱。通史要求上下相通，即通古今之变，找出哲学发展的总规律。还要求左右相通，即和每一时代的思潮相呼应，与宗教、文学、艺术、科学等意识形态挂上钩。只有对上下左右进行一番全面的探索，才不会把哲学流派的活动、哲学范畴的出现、哲学问题的论战看作一些偶发事件。近三十年来由于我们对一个一个的人，一个一个的问题的研究做得不够，也妨碍到哲学通史的水平提高。这应是一条治史的原则。因为个别的、局部的问题没有搞清楚，总体和全局也难以看得分明。这些年来我们忽略专题的研究，对哲学家的原著没有花太力气去钻研，空议论较多，可以说是走了弯路。

像朱熹这样的关键性的人物，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旧的理学家称朱熹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也并非全是夸张，朱熹在哲学史上确实有其重要性。不论人们是喜欢或不喜欢他，对他应当认真去研究，这是无可争辩的。

张立文同志以他多年的功力，在他的著作中，从朱熹的生平到学术活动，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到经济思想、政治学说都进行了探讨。对朱熹哲学的重要范畴，如理、气、性、命，都作了严密的分析。这部著作对于多年来重观点不重视史料的空疏学风有所矫正，这些都是值得欢迎和肯定的。

当然，对朱熹这样一位后期儒教集大成者，还有许多更细微曲折的地方有待于继续发掘，要求在一部书里解决很多问题是不现实的，也不是短期内三五年内可以办得到的。因为朱熹一生所涉及的学术门类相当广泛，他自称心传唐虞道统，明伊洛渊源，崇洙泗，黜二氏。有识之士早已指出他于释道两家，阳挤之而阴受之。这些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

现在一般看法，认为朱熹的哲学体系是客观唯心主义，本书对此也做了认真的剖析和论证。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特点及其内在的逻辑发展层次，每一个研究者还可以有不同的剖析方式，也应当有不同的出发点和落脚处，对朱熹的许多重要哲学范畴的理解也应当允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此连带引出的对朱熹哲学体系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大有从不同角度深入钻研的余地。对朱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应当有各种高下不同的评价同时并存，不宜强求一致，也不能强求一致。

还必须看到，朱熹一生心血凝聚于儒家经典注释中，他于《五经》、《四书》用力最勤，与王夫之的《尚书引义》、《周易》内外传、《读四书大全说》同样是寓创造于注疏之中。朱熹的注释，有的开始于中年，有的贯穿他的全部著述生涯，有的直到晚年尚未完成。其著述的先后过程与他思想的发展脉络至为密切，如细加分疏，必将对于了解其哲学全貌有所裨益。

朱熹文章信札保留下来的数量很多，其中也有属于信手酬答，仓促急就的，如仔细分别，尚有自相牴牾之处，就中如何取舍，均须全面斟酌。《朱子语类》分门部勒，明白易晓，为学者们喜欢援

引。却也应当看到他对弟子们问答，有时为了强调某一方面，其间详略轻重时有歧异，或出于应机答对，不尽周详，故《语类》所记未可尽从，朱子的及门弟子中已有过疑问，此中取舍标准，尚须进一步研究。这也是研究朱熹的思想的人们容易忽略的。

朱熹多才多艺，遗留文学作品不少，其中有吟风弄月的，有感事咏怀的，也有通过形象思维发挥他的哲学观点的。这也是宋诗不同于唐诗的一个特点。如能适当注意，取精用宏，那么，我们对朱熹的哲学的理解又增加了一个侧面。哲学文学都是朱熹的思想的表现，若能合并考察，就更可以加深了解朱熹思想的全貌。

朱熹学术活动时间较长，约有半个世纪，与当时思想界、文化界、政界上层人物交游至广，其门生弟子遍朝野。当时重大论战朱熹曾亲身参与，随着双方以至多方辩论的逐渐深入，问题的矛盾也一步一步展示出来。倘能把这些论战进行整理、排比，不但可以说明朱熹的思想，还可勾勒南宋中期一代思潮概貌。《宋元学案》著者虽有见于此，惜囿于时代，蔽于儒教，浅尝辄止，掘井不及泉。深入探究，尚有待于后来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这里只是随手略举研究朱熹哲学思想尚有待于发掘的几个方面，实际上当不止这些。我只在于说明研究朱熹这样的哲学家，不是仅仅从一个角度就能一眼看透的，即使看到了，也未必一眼就看得准。对朱熹的历史评价，是非功过，更不是一部书就能得出确定不移的结论的。现在有了第一部专著，就不愁第二部、第三部以至更多的有关这一方面的著作问世。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的局面终将到来。学问无止境，有如登高山，攀登愈高，所见愈远；有如探幽谷，行程愈深所见愈奇。研究无止境，研究就是学习，活到老，学到老，愿与中、青年同志们共励。

任继愈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于北京

前 言

蔡元培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中说，我们要编成系统的中国哲学史，“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就是讲要用西方人的一种世界观、方法论来治中国哲学史，这个说法有一定借鉴意义。那么，我们无疑要学会根据中国哲学的特色，运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的方法，来整理中国哲学史古籍，剖析哲学思想体系，寻求哲学思想发展规律。点中国哲学思想资料、文本之“石”，而成科学的中国哲学史之“金”。然而，近三十年来，对哲学家的思想，曾习惯地按其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伦理论、历史观等方面，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和研究，这虽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是完全必要的，也取得了成绩，但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是不够的。因为哲学家哲学体系的各个方面及其基本范畴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从而构成了一个整体。“分门别类”的研究，往往于整个哲学体系内在的逻辑联系注意不够，而只有深入揭示某一哲学范畴体系的内在的哲学逻辑结构，才能如实地反映该哲学体系的本来面目。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哲学史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因此，即使只是在某一个问题、思潮、人物的哲学思想分析上要合乎事实的哲学史的要求，也需要多年冷静和艰

苦的科学研究的，在这里只凭现成的原则、公式或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对每一哲学思潮、人物的特殊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把它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在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家各派哲学，以及各种不同性质的哲学体系，它们作为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螺旋式前进的大圆圈中的一个圆圈，都有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必然性，也有其历史的积极作用。对于这种历史必然性，切忌采取简单化、公式化和直线性的方法。《朱熹思想研究》试图从朱熹的思想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不拔高，也不贬低，给以一定的应有的历史地位。

要注意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和教训。研究哲学史是为了锻炼和发展理论思维能力。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不能一刻没有理论思维，而这种理论思维能力必须加以锻炼和发展，为了进行这种锻炼，学习以往的哲学，是一种最好的方法之一。《朱熹思想研究》试着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和教训，以图有益于这种锻炼，有助于树立和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要批判地继承。哲学史和社会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后一个哲学体系的建立既是对其前辈哲学的批判，也是继承，这便是和合地创造。这种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和改造、消化各个不同时期和性质的社会形态所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批判地继承与综合地创造的结合。对于中国社会长期所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于儒家思想集大成的朱熹哲学，必须区别其精华和糟粕。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这就是批判继承。《朱熹思想研究》努力避免把朱熹思想当作死狗一样扔掉，一笔勾销就算完事，而是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有价值的成果和合理的因素。同时，必须吸取各国优秀文化思想，使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起来，以有益于现代化，以便能创造性地发展。

这些要求，主观上是企图去做的，但学力有限，不一定能做好。况且朱熹是一个相当博学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

家，著作量大而面广，于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佛学、道学以至自然科学，都有涉及或有著述。《朱熹思想研究》虽从经济、政治而至教育思想，从哲学、自然科学、美学、史学、伦理以及历史观作了初步探讨，但有些方面仍未涉及或未深入。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承蒙张岱年、任继愈、石峻、辛冠洁等教授的鼓励和鞭策，他们在紧张和繁忙的工作中，或全部或大部审阅了书稿，提了宝贵的意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经济学说史教研室、中国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的同志看了有关章节；厦门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同志，提供了朱熹的像和手迹；在定稿中又蒙赵宗正、默明哲等同志的帮助；且得辛冠洁同志为本封面题签，谨志谢忱。

本书虽三易其稿，但缺点错误实恐难免，万望读者不吝赐教，俟后改正。

作者

一九八一年一月于北京

再版序

我大半辈子与朱熹思想结缘，既有神会的愉快，又有现实的烦恼。1960年我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留校，提前到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任助教。20世纪60年代，是“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时代，教研室分配我着重研究宋元明清哲学，我便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宋元明清哲学的研究，并把重点放在朱熹哲学思想的研究上。当时绝没有想到二三十年后朱熹思想会成为研究热点，“朱子学”成为“显学”。

可是朱熹在世时并不显赫，不仅迭逢厄运，而且连遭打击。像朱熹这样鞠躬尽瘁为宗法社会长治久安建造伦理道德、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的思想家、教育家，却被攻击为“资本回邪，加以忤忍，剽窃张载、程颐之绪余，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褒衣博带……潜形匿迹，如鬼如魅”^①的人。这就把朱熹描述成一个结党营私，图谋不轨，不孝不忠，欺君罔世，事魔妖术，如鬼如魅之徒。其造谣诬蔑，无所不用其极。于是，他们一方面要消灭朱熹的肉体生命：“熹为大奸大慝，请加少正卯之诛”^②；另一方面要禁止朱熹学说的传播，消灭其学说生命，把朱熹学说打成“伪学”。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四，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145页。

② 同上。

朱熹为“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请将语录之类尽行除毁。故是科取士，稍涉义理者，悉皆黜落”^①。要烧毁朱熹语录等著作，使之不能流传；科举取士，不得涉及“义理”，否则不取。合此两方面便是“斩熹以绝伪学”^②，政治压害到了极端。因此把朱熹打入“伪学逆党籍”，其学为“伪学”之首，其人为“逆党”之魁。用现代话语说，就是“罪该万死”的了。朱熹“门人故交，尝过其门凜不敢入”，甚至更名他师，以自别其非党，可见政治氛围之紧张。就是朱熹死后，亦不放过。右正言施康年奏言：“‘四方伪徒欲送伪师朱熹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世人之短长，则谬议时政之得失，望令守臣约束。’从之。于是门生故旧不敢送葬。”^③连谈论世人短长和时政得失，都害怕得要命，而下令控制约束，可见统治者之虚弱、无理和专制。

现实是黑暗的，政治是荒诞的。宋宁宗赵扩既可以诏立“伪学逆党籍”，又可以诏赐朱熹谥曰“文”，世称“朱文公”，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真是反手为云，覆手为雨！

随着历史的演变，到了宋理宗和元明清之时，昔日的“伪学逆党”、“诋诬圣德”的异端邪说，“图为不轨”、“几至大乱”的大逆叛行，翻身一变，而成为“祖述宪章”、“启迪后贤”的明道之学，“道德事功”、“爱君忧国”的治国之道。以至非朱子之学不习，非朱子之礼不行。其学成为“绝对真理”，官方哲学，其人成为继孔子之后的圣人。到了这个时候，朱子学的地位便从地狱到了天上，于是又翻身一变，成为“真理”的化身，圣人的再世。于是统治者便可摇晃着朱子学的大旗，敲打着那些所谓有违朱子学的学说和人，以至把“异端邪说”、“叛经离道”的帽子扣到这些学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四，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137页。

② 同上书，第4145页。

③ 同上书，第4176页。

说和人的身上，甚至到了“理能杀人”的地步。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反反复复？历史究竟是公正的还是非公正的？历史究竟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历史中的这种现象犹如中国古代家庭中的婆媳关系。媳妇受婆婆的压迫打击，唯命是从，不敢反抗。当媳妇自己当了婆婆又去虐待鞭打媳妇，媳妇绝对不可违背婆婆的意志，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历史的这种循环往复，何时能了！

历史为什么会重演？这种“重演情结”如何化解？这是很复杂的。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以及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李贽所生活的时代，程朱理学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明神宗朱翊钧诏批李贽罪状是：“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①这与南宋加给朱熹的罪状，何其相似乃尔；朱熹与李贽同生在福建，朱熹是“欺君罔世”，“图为不轨，动摇上皇，诋诬圣德，几至大乱”^②，李贽是“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状相似，此其一；其二，李贽书遭禁烧毁，朱熹的书也“尽行除毁”。两人著作的命运也相似。其实愈是要“烧毁”、“除毁”，愈是偷偷地广泛流传。以史为鉴，我们能否从这种现象中，获得一点体认和启迪。

朱李两人之所以有此相似遭遇，是因为他们的思想都是当时时代精神曙光的“先知”者，这就是说，他们的思维观念都超越了当时主导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具有超前性和创新性，而不与主导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同流，甚至与之相背离而树起批判现实社会思潮的旗帜，从而被视为“敢倡乱道”、“诋诬圣德”。

作为主导意识形态，需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以使人有所遵循，但千万不可将其僵死化、教条化、绝对化。其实连续性是文

① 《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九。

② 《道学崇黜》，《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

化流行的过程。文化流行，应该开放改革，不断创新，这样才能生生不息，惟变所适。回顾历史，使我们对一些问题的体认更清晰和深刻。

这次再版承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张树相社长和冯春风主任的支持和帮助，使我有机会改正了其中的一些错字和疏漏，谨致谢忱。

张立文

2001年2月10日于静思斋